

难忘一九八九

作者：王辉云

一九八九年注定是一个难忘的年头儿。这一年发生的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自八七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后，我一直闷头读书，准备早日拿到学位回国为北大效力。我曾答应推荐并大力支持我来美读书的季羨林先生为文革后中国刚刚起步的南亚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来美后，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专业书。这样做，既对自己的师长有所交代，也不辜负那个充满希望的八十年代。

一九八九年的神州大地，惊雷滚滚。

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在西单民主墙张贴《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和《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等大字报而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间，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知名科学家，分别联名给中共党政负责人写公开信，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诉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这些人中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华人纷纷呼应，发起签名运动表示支持。

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不少50后、60后的热血青年。他们身在海外，心系故国。签名运动在芝大中国同学中引起了积极反响。书斋中，我看到理想主义的晚霞绚丽多彩。

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课堂上，中国政治改革走向等话题成为课上讨论的焦点。

四月十五日，因同情学运遭罢免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接踵而来的学生上街游行的消息，使芝大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的各种研讨会霎时间变成了声援国内学运的聚会。由于当时国内消息的主要来源是报纸电视，关心国内局势发展的同学便经常自发的举行集会，通过一些同学的特殊渠道了解学运情况。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国内学运在规模和性质上发生了极大变化，当北京大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的时候，芝大中国同学对国内学生自发的同情和声援便顺理成章地演变成有组织有目标的具体支持。程玉等同学带着芝大中国同学的捐款返回北京，在芝大的中国同学分分钟地保持与天安门广场学生组织的联系，记得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的几次大规模游行几乎与北京学生的游行同步，我的一些美国同学和朋友都参加了游行。

“四·二六”社论将此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做法在海内外引起激烈反弹。北京广大市民及各界人士对学运的支持和声援使这场学生运动迅速发展成全民参与的爱国民主运动。

从报纸上看到王邦维学长陪着季羨林先生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消息后，我更坚信这次学运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中共领导人加快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密切关注学运走向的邹倪教授也认为，这次学运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进一步巩固政治改革成果的契机，尽管他主张党政分离，健全法制，党内派别公开化的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在同他谈论“四·二六”社论的时候，邹倪教授表示出对学运激进主义倾向的忧虑及其结局的悲观看法。潜意识中，我也觉得中共当局迟早会对这次学运进行镇压，但万万没有想到会用“六·四”屠城的方式。

“六·四”屠城之前，美国三大电视新闻主播齐聚北京，CNN的滚动新闻几乎全天播报中国学运。那些天，我几乎每天都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与同学交流对这次运动的看法。其实，我周围的同学也大都如此。透过电视画面，我不但看到一些社会名流在天安门广场慰问绝食学生的温馨场面，还看到了多年未见的大学生同学在接受CNN采访时熟悉的面容。更令我感动的是北京的老百姓，他们堵军车，自觉维护社会治安，为被围堵的士兵送饭送水。

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学运发展成一场全民参与的爱国民主运动，这种群众性运动无疑缺少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如果中共最高领导人能够因势利导，利用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惩办贪腐，中国的政治改革势必能向积极方向发展。然而，中共领导人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武力镇压的方式对待群众运动。

“六·四”的枪声打碎了人们对中共能够顺应民意推进政治改革的热切期望。赵紫阳的下台和对这次运动的严厉镇压，标志着刚刚起步的政治改革毁于一旦。

邹倪教授的忧虑不幸成真。作为一位对中国政治改革抱有颇高期望的政治学大师，他的痛苦溢于言表。

“六·四”屠杀翌日，芝加哥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国学生大游行。来自周边十几个州几十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聚集在位于密西根大道上的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抗议中共当局野蛮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暴行。尽管都知道领事馆会有人录像，监视游行动态，但参加游行的人们无所畏惧。当游行队伍集中到 Grand Park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体制内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突然振臂高呼，退出中国共产党，没想到竟有几十人响应，当下成立了一个退党委员会。

中共当局用正规军屠杀平民的暴行冲破了人类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也激起不少党员干部的强

烈不满。“六·四”过后不久，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就有两对领事夫妇宣布脱离中共当局，在海外引起不小的反响。后来，我曾经在一位朋友家聚会时见过他们，并对他们的选择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六·四”过后，中共当局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就是掩盖事实真相，对国内民众实行新闻封锁。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鲁迅先生这句名言只适用于北洋政府，却不适用于中共这样的集权主义政权。事实证明，中共实施新闻封锁掩盖历史真相的政策还是相当成功的。这些年来，我曾多次问过现在的年轻人关于解放军在“六·四”时开枪杀人的事，很多人都不相信，有些大学生甚至连赵紫阳何许人都一无所知。

为了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向国内人民揭示“六·四”真相，海外中国留学生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电台广播是最为有效的打破新闻封锁的形式。然而，由于条件限制，留学生自办广播电台困难重重。我的同学李三元是个敢于打破常规的主儿，在别人还在收集传真号码、向国内散发传单的时候，他邀我一起创办“六四之声”电台，负责广播节目的编排工作。

“六·四”的枪声也使我学成回国在体制内工作的残存梦想彻底破灭。当我向系里提出暂停学业，全力为电台工作的想法时，得到教授们的大力支持。

走出书斋的感觉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起初，“六四之声”电台租用印第安纳州Gary市的商业广播电台频道向国内播音，收听范围相当有限。随着愈来愈多的同情民主运动的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援助，“六四之声”在同年九月得以利用大功率发射台向中国大陆播音。

“六·四”后，海外民运气势如虹。然而，这种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由于工作关系，我们对海外民运组织多有接触，在采访中，我深刻感觉到，共产党文化已形成中国文化的新传统，一元化思维方式，唯我独尊的个人作风和缺少宽容妥协的处世态度是造成海外民运组织分裂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八九民运产生“六·四”那样的悲惨结局的原因之一。

有鉴于此，我对传播自由主义、多元文化情有独钟，在编排撰写节目时，始终坚持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通过各种方式对“六四之声”的广播给予了赞扬和肯定。据说，“六四之声”也受到中共“内参”的多次点名批判。

一眨眼，“六·四”已经三十年了，但中国政治改革的路途依然遥远。

六四事件的联想和期盼

作者：
臧英年



▲ 1989年六四前夕天安门广场，学生把冰糕递给军人。（图源：看中国）

六四事件30周年已至，我是该事件的目击者。1989年5、6两月我住在北京朋年大哥家里，经历了整个事件的过程。美国《纽约时报》编辑部于6月2日发表了一篇评论六四的文章，标题是：“中国不能抹杀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措辞严谨，寓意深远。其中有几段说到：

“一个国家对本身历史罪恶认错的态度也就反应了它崇尚自由的程度。”美籍华人《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张纯如女士于2003年10月24日在旧金山市立学院参加“南京大屠杀索赔联盟模拟审判”时发表讲话，针对日本抹杀南京大屠杀事变的一段警言是：“一个国家拒绝向其国民揭示基本的历史真相，一个国家要向其国民杜撰历史，此一国家便也断送了它走向民主的未来，并且会让历史重演，重蹈覆辙。”张女士这段话移用于中国对六四事件真相的抹杀是恰得其用，适得其所。

《纽约时报》的评论里将中苏并列，两者都是习于用审查和暴力去掩盖历史真相，其评论说：“假如对发生事件可以公开讨论，就会涉及一些严肃的问题，例如：自称永不犯错的党的判断力究竟如何？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是否实际上受了大屠杀的影响而延迟出现了？假如中国接受了示威者追求民主改革的要求，中国今日是否会像台湾或香港一样更加繁荣？”针对这些问题我的答案是：中共从延安时代开始到如今，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内斗、伤民、误国，只是永不认错，自夸自己是永远的“正确、光明、伟大”。或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有错会自己更正。”再有，天安门大屠杀显然是延缓了中国经济腾飞和民富国强的进程，并错过了国家体制转型、步入自由民主康庄大道的良机。

《纽约时报》的结论是：“天安门事件后的30年，中国已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的领导阶层并没有与时俱进，继续拒绝示威者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独立的司法系统、结束一党专政。”

现年66岁的江林女士，六四事件发生时她是中校军报的新闻记者，其父乃中共将领高官。她当天骑车奔赴天安门现场，身受镇压士兵的重击负伤倒地，不肯暴露个人的军人身份。不久前她离开大陆，在接受采访时说，她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去弥补流血事件的罪过，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就是脆弱的。”她又说：“你连杀人都不承认，你就任何谎话都可以讲。”六四事件爆发前，前《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在《上海经济导报》上撰文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社会的真正稳定。”这是真正爱国者的真知灼见，岂能漠视和忽略？（我于2012年9月14日在北京医院探视胡老，两天后他与世长辞。）

爱国爱民的老作家巴金，文革后曾撰写“随感录”，细数个人在运动洪流中的经历、感受、观察和醒悟。我熟读全集，并请全国文联为我安排和他见面。1982年9月25日我自北京飞抵上海登门拜访，相谈甚欢，并摄影留念。至今我保存了三集他签名送我的著作。他告诉我，希望中国建立“文革纪念馆”，以史为鉴，革新自强，此一愿望迄未实现。还是那句老话，“文革的真相和创伤能够全面抹杀吗？”

亲历六四

六四事件发生时，正驻守当地的《纽约时报》北京站主任克瑞斯多夫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标

题是：“当中国大量屠杀自己人民时”，文内说：“习可能以为自己大获全胜，他埋葬了历史，控制了香港，压迫了宗教，管制了网站，监禁了律师和记者，并且抹灭了30年前我在天安门看到的事实……”而他的结论却是：“但是我们在30年前目睹北京之春的一批人是信心十足的，最终和难以预测的是，自由的浪潮会重新掀起。”

参加六四运动的一些健将如王丹、吾尔开希、封从德和浦志强等近来接受新闻采访，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参加运动，身受牺牲也在所不辞，值得付出。中共当前缺乏改善，他们要将六四事件的正确信息和精神传递下去。

1989年5、6两个月，我正在北京。5月中旬目睹了群众前往天安门广场热烈追悼胡耀邦的去世。随后学生和市民开展了游行示威，主旨是企求改革体制，消除官倒。没有任何意愿和行动要推翻中共的统治。

那时我手持美国护照和“上海经济导报”钦本立社长给我的记者证，可以自由出入天安门广场示威群众在广场四周设立的保护圈。我又身怀照相机和摄影机进入广场，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处设置的指挥台，兴致所至，随时拍摄。街头游行队伍及其横幅也取得其时，收入镜头。六月三日，我在东华门门口看到门内人员冲上街头，群众落荒而逃的情景。人民大会堂门前驻守的士兵被群众控制，我去拍照，受到质询。我表明身份后，在场者大声说：“让他好好拍照……”我也在广场的播音室播报了我赞美运动的打油诗。

六月三日午夜前，解放军挺进天安门广场，发射扫射，许多伤者在护送下进入附近北京医院急诊室。都是

手无寸切、爱国心切的市井平民，他们无辜受难，数以千百计。六四清晨，我走去天安门广场，看到坦克车围成方阵，炮口朝外，威风凛凛。却有一个市民在广场边沿，歌舞笑骂，奋不顾身，幸好那时未遭射杀。

见到如此恐怖不堪的局面，我认定北京非久留之所，打电话给国航一位领导，请他助我登机离开北京。他热心承诺说：“只要你能设法到达机场，我一定可以送你登机。”六月五日中午，我手提装有50卷照相底片的小箱，在长安街建国饭店门前发现一辆出租车，付了400元人民币的车费直奔国际机场。现场有数家美国电视台工作人员进行采访，我毫不保留地直陈了我的感想。事件发生后美国对北京的电话已打不通，爱妻在美焦急万分，却在电视节目里看到我侃侃而谈，知道我登机在即，可脱离险境，因而放下心来。

六四事件已过去30年，往事已矣，今后如何呢？中共粉饰六四事件的政治宣传和手段有三。一是，宣传爱国主义，痛数往年列强对中国的欺侮，要自强，要爱国，就要团结在中共周围，受其领导，听命于它。二是，强调安定团结的重要性，没有六四镇压，就没有其后国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珍惜这份成果，要保持社会稳定，维稳重于一切。把维权的一切行动都列为是破坏维稳的倒施逆行。三是，将六四的信息和真相埋没下去。对六四真相不予讨论，对六四人物不加报导，对纪念六四的任何活动铁腕打击。把这些措施施加在一起，就可形成一座不透风的院墙，将人人圈入，动弹不得。

[\(下接第B2版 →\)](#)